

发展与改革前沿

# 对全球化结构的一种理解<sup>\*</sup>

章建刚

**【提要】**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语境，但对全球化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全球化进程被看成同心圆式相互叠加的三个层次：现代化、市场化和美国化。不同国家在面对这三个层面的历史境遇时展开了各种类型的国际交往，也推动了全球地方化的运动。笔者以一种分层的结构描述动态的全球化进程，从这种结构性关系出发更容易全面、深刻地理解当前世界在文化、经济与国际政治这三个方面发展的相互影响，从而更冷静、从容地应对复杂纷繁的国际局势。

**【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化 市场 美国

〔中图分类号〕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0) 04—0005—08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处于全球化的境况当中。而应该庆幸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日趋自觉地切入这个全球经济—文化进程，正在努力获得自己的竞争位势与全球视野。这时，在实践中不断深刻理解这一人类进程变得更加重要：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是政府主导的，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毕竟又是对民族国家主权利力的挑战。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从经济全球化逐渐发展成为文化全球化，其方向和目标处于不断选择和调整的过程中。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被卷入到全球化当中来，并不断改变着全球化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图。其间，经济全球化像是一个基点、出发点，但游戏规则也在不断构建当中，最终会在发展中实现各种文化价值目标的融合汇通。文化全球化则像是一个目标或终点，同时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市场规则的构建与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发展潮流让人们遐想一个时代转折点的到来。<sup>①</sup>同

时，全球化趋势构成了对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利力的挑战，而全球治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终形式，因此启蒙在今天仍有不应被轻视的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对全球化有一种结构性的理解。

世界上关于全球化的讨论越来越嘈杂。除了不断代模式的现代史著作对这个星球的历史进行宏观的、也相对客观的描述<sup>②</sup>以外，对全球化进行积极或消极评价、对其前景进行乐观或

\* 本文的写作得到福特基金会的项目资助；本文是王洛林先生主持的《全球化与中国》项目的一个子课题。

① 参见 [加] D. 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高广卿、陈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参见 [美] 迈克·亚达斯、彼得·斯蒂恩、斯图亚特·史瓦兹《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大可、王舜舟、王静秋译，尤其“第四章 崩溃之后：迈向新千年”，三联书店2005年版；[美] 特伦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吴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

悲观预言的著作<sup>①</sup>正在加速度地生产出来。可以明显地分辨出，持（经济学）自由主义观点的作者往往是积极的和乐观的；而持（传统的）人文主义观点的作者以及另一些经济学家往往是消极的和悲观的。二次大战以后建立起的联合国机构甚至也已表现出某些分歧：由关贸总协定（GATT）演变而来的世贸组织（WTO）更多秉持（经济学）自由主义观点，主张推进全球化；而教科文组织（UNESCO）系统则在一定程度上将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迅速消失、文化多样性状况的恶化归咎于快速全球化进程，希望对其有所约束。显然，对全球化的理解没有纯然客观的立场，所有各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利益驱动的。如果说全球化也是一个学术话题，那么这种讨论同时也是一场充满玄机的紧张博弈。所有人的话外之音都值得深入解读。

在我看来，全球化首先是一系列极为现实的全球问题。全球化的现状远不像“地球村”的比喻那样暗含着一种前工业文明的温馨。由于技术、市场、消费社会的发展，能源和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例如极地臭氧层的破坏造成全球气候明显异常，而二氧化碳有效减排在各主要工业化国家间很难达成有效协议。又如各国最终要凭借军事力量立足，威胁全人类安全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正面临失控的局面。此外如禁毒问题、防治新型恶性传染病问题等都明显依赖国际合作。要有效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就需要真诚而深入的全球合作。而这种合作需要以对全球问题或全球化进程的根源和本性的理解为前提。为此我们愿意从三个层面对全球化进行解读：现代化、市场化和美国化。

## 一、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结果

关于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有不同的看法。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将现代化看成个人及由这些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生成。所谓个人，在哲学上被叫做主体或个性，而在经济学、法学上被叫做财产权和个人权利。这时所有的个人都从此前的人身依附状态下解脱出来，其精神上的

解脱更是被唤做启蒙。这个从17、18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的进程同时是指向全球化的。反过来说，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落脚点。这是因为，个人及其权利和尊严的觉醒是无法阻挡的，同时更加富裕的生活及生发的文化表达是人类无法抵御的诱惑，而对话是实现人际间沟通最为符合伦理的方式。如今这些普遍的价值除了通过亲身感受被人了解，也通过建基于高效复制技术的全球媒体网络进行传播。

个人，或所有私人的觉醒也促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现代政治制度将个人权利组织在一起，传统国家则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向现代政府转型。这成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现代社会本来也是启蒙的产物，公共传媒和种种文化表达成为公民社会一个重要的载体和组成部分，传播没有边界。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文化因此变得繁荣而通俗。伴随着它们的发展演变，人们可以看到印刷技术、广电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依次普及。

现代化甚至已经步入“晚年”，人们用“后现代”或“第二次现代化”标称现代化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分界，原本多发生于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现在更频繁地发生在传播和消费环节。高技术（high-tec）与高文化（high-tach）联姻的“知识经济”崛起，人们要求更多的文化消费，旅游与娱乐风行，文化与新媒体日渐昌盛，而哲学的“宏大叙事”日渐低沉，交往正进入细节。在线即表达，表达即存在。文化交往更频繁，而文化冲突也时有发生。显然，全球化进入了深度现代化时期。

## 二、全球化的主要推力是市场

应该说，现代化一些物质层面的变化都是透过市场经济的环节实现的。历史已经表明，强调效率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具有比较优势的制

<sup>①</sup> 前者可参见[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新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后者可参见[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度安排；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而等价交换是其能够大行其道的内在伦理准则。通过广泛的交换和遥远人际关系的建立，人越过了自然经济的疆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民族国家垂直等级体制的限制。在市场经济中，并非只有少数英雄可以出人头地。同时，市场似乎特别垂青技术，技术使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其数量级，反之市场竞争也支撑了技术的迅速进步。

由于利益的驱动，人的觉醒也可能使更多的恶释放。经济人也可以有权力意识，也会使用某些暴力（power）的手段。因此，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市场完全可能是新的史前丛林，重演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进程。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阶段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以私有财产和自愿交换为基础的法律构架”，并认为“该架构支持发达的商业、工业、技术和市场体系”。<sup>①</sup> 在市场化初期，马克思就从另一个角度描述这一历史进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他的描述有更多文学色彩：“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sup>②</sup> 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马克思描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③</sup> 他还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④</sup> 还有的学者较为克制地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经济时代”，以区别于今后可能到来的“文化时代”。<sup>⑤</sup>

在今天看来，所谓市场化或资本主义是说人的觉醒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要温饱富足，而且还要无极限地积累抽象的财富即金钱，仿佛在今天，就要把明天乃至永远取回来锁进自己的保险箱。而金钱的保存不同于黄金作为一种矿物质的保存，它必须在不断的运动中保值增值。这个过程做大了市场，也使人类可用于分配的物质消费品总量不断增加，但一方面造成贫富差别的加剧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的迅速恶化。人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触到了“增长的极限”。

尽管市场被经济学家中性地称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也承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对于哪些现象属于“市场失灵”并不存在严格的界定。一般说，尽管市场经济非常注重需求和消费偏好，但这里说的需求仅指有效需求，即有货币购买支持的需求；而社会中总有一些必要的需求缺少货币支持。市场经济需要激励，承认不同个体在智力体力上的差异。但有效需求不足有时也被归咎于分配不公，贫富差别过大。市场通常对公共需求反应冷淡。在竞争中，缺少资本的主体的确比资本雄厚的主体更少讨价还价的条件。这都是些不足为怪的一般说法：市场经济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活动；离开了财富创造，什么问题也无法解决。反之，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或国家，公共福利通常也更好一些。然而从基本制度的层面上说，市场机制并不是自足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需要外部支持。市场经济首先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要有行之有效的司法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能力来体现。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初创时期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就发生过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

① [美] 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 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3、254、255 页。

⑤ 参见 [加] D. 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高广卿、陈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境况。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的当代中国,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假货驱除真货,劣质产品驱除优质产品的事件也不少见。我们知道,这套法律制度通常是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来推行的。除此之外,市场天然趋向垄断。如果没有特定制度管制,垄断也将造成市场的崩溃。市场还会发生种种很难自行纠正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经济萧条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因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市场要求“看不见的手”显形,成为“看得见的手”即法律和政府。

跨国公司的出现已经使政府对企业 and 经济的监管变得困难,首先就使税收变得困难。这是因为企业不断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转移。这种高速全球化——全世界资本的联合——甚至在发达国家里也造成了反对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因为不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夺去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而这些机会本身是与其工会运动长期发展所推高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一些反全球化的意见声称全球化同时是对民主和福利的打击。<sup>①</sup>

市场动机强有力地推动着金融业的发展。股票、外汇、期货、基金、风投等各种现代金融产品交易即所谓符号经济的运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实物经济的范畴。人们通过想象“炒作”未来的“机会”;人们对风险进行投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赌博:要知道,“股市中的武器……是资金、谣言和政治”。<sup>②</sup>金融业的发展甚至已经扭曲了实物经济的价格形态。但也有作者充满憧憬地预言“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即金融全球化。<sup>③</sup>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索罗斯的名字和他手里的热钱已经令东方和西方的政府、全世界的股民心惊胆颤;而2008年从美国的房地产接着是金融体系开始的经济危机至今还局势未明。在全球涌动的大笔游资甚至比政府更有力。政府主观运用金融工具调控经济的努力都会变成它们进行投机炒作的题材和机遇。

今天,无论是个人致富的决心和努力,还

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冲动,其前景都变得晦暗,因为全球性的资源甚至粮食和水的紧缺已经到来。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制度缺陷、脱缰似的腐败都会因国际竞争的激烈而得不到修补和治理,而失败国家的自暴自弃将成为新型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条件。马克思、巴尔扎克或莎士比亚,他们的想象力是丰富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辛辣的。但他们都没有预见到像“9·11”事件那样的残暴和恐怖。看来,作为全球化推手的市场化过程正在给全球化带来问题。

### 三、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带有美国化的色彩

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场所,因此总会有人占得先机,成为凭借优势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的大赢家。与通常博弈有所不同的是,这个赢家还要进一步制定或改写游戏规则,以确保其未来的利益。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成了市场的天然单位。现代化中的市场化要求对内将市场原则作为处理发展、协调人际关系的制度基础,对外则要求将其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在20世纪后半期,美国无疑成为了这个大赢家。美国对全球化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团队的研究对这个过程予以一种中观的描述。<sup>④</sup>由于“二战”中美国的不动产及整个生产能力未遭到破坏,战后又施行“国际军事凯恩斯主义”,较好地解决了世界性美元紧缺的难题,因而不仅造就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也带动世界经济经历了“辉煌的30年”。<sup>⑤</sup>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取得了对整个

① 参见《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② [德]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资本战争》(原名:《Die Grossen Spekulationen der Weltgeschichte》,可译为《世界投机史》),王音浩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③ 参见《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

④ 参见《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

⑤ 参见《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第二章 国家间体系”、“第八章 全球概观,1945—1990”。

世界尤其西方世界的“领导权”：这种权力“比起纯粹由赤裸裸的强权所确保的要大，然而比起由完全合法的权威所保障的要小”。<sup>①</sup> 尽管该项研究认为，美国在1945年开始的这个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已经于1967年~1973年间从巅峰状态走下，但在1945年战胜德国取得世界霸权后，美国一直与前苏联进行着艰辛的政治与经济的角力，只是在1989年苏联解体后才真正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减少了的军费开支押到了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上，使这个轮上的大国（country on wheel）再次成为网上的大国（country on line），并借此抢占了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国家的各项硬实力——经济、军事、外交——始终强大，并在很大程度上挟持着联合国。美国通过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后的世贸组织（WTO）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全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强力贯彻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不仅在计算机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自觉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从国家（文化）软实力中获利。<sup>②</sup> 应该说，美国在当代世界上的道德形象并不高；美国自身对于欧洲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也保持了相当的敬意。但可以看到，其一，美国的电影产业经过几十年市场“打拼”（而不是靠大量的政府补贴和管制），主动迎合文化多样性的需求，甚至也战胜了电视娱乐方式的挑战，终于扭转了1930年代法国电影对美国市场主导的局面，并将好莱坞的影片发行到了全世界。<sup>③</sup> 其二，在后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艺术中，美国拥有部分一流的作者和作品。此外，不少作者认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也在世界各地传递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文化。

美国实力独大并没有大到可以单独统治世界，却在两方面造成了不安全感：一方面是世界许多区域或国家感受到美国的傲慢和压力；另一方面是美国感觉更不安全。冷战后比较简单的两级格局及其联盟格局被打破了，数量稍多的第二层级力量中心显现出来。它们既代表了不同的文明或者是价值观，也代表了共同的

发展愿望。这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竞争中产生的紧张。问题是谁或什么机制可以消除这些紧张？有美国学者认识到：“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美国自身以及世人如何看待美国。”<sup>④</sup> “9.11”事件让美国受到了空前的打击，珍珠港事件之后其不安全感从没有这么真实。敌人不现身，也无法被指认到任何国家，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取“规制主义”，<sup>⑤</sup> 实行“单边主义”。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开战是建立在错误情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驻守伊拉克的多国部队很快变成“少国部队”，国际恐怖主义并未因此被消除。而正是“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在世界上引起了更多的不安全感，包括美国人自己的不安全感。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问题是如何克服这种进退两难处境。据说一位南非人曾说，“美国若能在撇开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为世界作出贡献，就能始终在世界上受到尊敬”。<sup>⑥</sup> 但美国政府作为民族国家民主制度的产物最终只可能代表多数本国选民的利益。这使其作为世界的领导不称其职。

#### 四、全球化是一个特定的互动与融合过程

逻辑上说，现代化使所有个人得以觉醒，因此是难以抗拒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但这种过程是在每个民族国家中逐一完成的。这里充满了内在的冲突。

① 参见《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第3页。

② 参见[美]约瑟夫·S·奈《硬实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泰勒·考恩《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王志毅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第四章好莱坞何以统治世界”。考恩书中专门提到“社会内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间的多样性”的分别，值得思考。

④⑥ 转引自《美学者：美国已成为世界“对立面”最大威胁是自己》，《参考消息》2008年7月19日。

⑤ 参见[美]理查德·N·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陈遥遥、荣凌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这种冲突被描述为内源性的；而一旦民族国家内部的斗争希望获得外部的支持，国际冲突就可能引发。而在后现代的今天，对少数拒斥或忽略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外部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冲突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而对于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不同国家来说，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由于全球市场和资源竞争、生态环境影响，也会有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发生。而如果这些冲突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那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也就会是众矢之的。在这些斗争变得极其激烈以致引起诸多全球性问题时，人们才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样的结果真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吗？而要从这样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有怎样的可能呢？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上述三个层面具有相互叠压、交错推进的特征，形成复杂的各自演化、相互影响的线索交织。这些叠压和变化合在一起，对相对全球化有着特殊位势的各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和要求，启动了各自“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进程。宏观地看，全球化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少数先期形成的民族国家通过殖民过程推行全球化；其次是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尊重之后，所有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另一种意义的挑战。显然，我们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将时间和空间的线索组合在一起，并且更关注当前的状况。

冷战结束，世纪交替，现代性或启蒙的各项目标似乎都已经实现，人类历史仿佛失去了清晰的方向，正所谓“历史的终结”。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对现代性和启蒙的反思兴起，人们要求克服现代性的单调，要求和前现代进行“对话”。多元主义或多样性成为理性新的主张。市场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当充分地全球化了，国际经济秩序大致有法可依。但由于金融、环境和平等、公正方面的指控，自由贸易原则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多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反全球化运动在市场问题上声音格外响亮。进而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文化产品和通讯服务的发展，文化认同、话语权、文化多

样性的问题在市场化背景下变得越来越突出。美国虽然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目前的国际秩序并不完全由它操控。美国的外交在“单边主义”和多边谈判、建立多种规制、继续在联合国框架内行动之间游移。美国在国际秩序的规制中，主要希望确立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长期稳定国际关系。但在操作中，很大程度运用国际军事凯恩斯主义手段。因而从政府的角度说，其公共财政支出是极为庞大的，安全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内容。问题是，这个在全球实现的安全目标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可能危及其他国家的主权，或与其他国家的价值目标相冲突，并因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度。可以说，全球化随着市场的扩张摸索前行。而现在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可否找到某种超越自身的形式。而如果找不到恰当的超越的形式，一些弱势或后发国家与地区在主权受到忽视或压抑的情况下，会凸显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甚至恐怖主义运动。本来作为反殖民化运动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民族主义，在存在主要民族的国家就是其主权的观念支撑；而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可能成为主权再分化的精神驱力。

美国化占据了市场化的中心；市场化占据了现代化的中心。因此，现代化尤其是它那些启蒙的特征和表达在当代社会处于边缘和下层的位置，同时也发挥某种原则和基础的作用。市场化或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它之所以可以从原始积累阶段走向后资本主义阶段，正因为各民族国家完成了它们的现代转型，具有了一种对市场进行调控、管制的的能力，并始终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市场进行着执着的博弈：向市场收税，以此滋养自己；同时使自己民主化，更透明，慢慢将更多服务功能转交给市场。这种双向的嬗变使各国社会变得更理性，更和谐。美国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居主导地位，虽然在这些过程中它有自己的利益动机，但先导地位赋予的规则制定要求本身不是完全的欺骗，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有比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更复杂的国际秩序和市场规则设计要求。这时文化的问题变得更突

出，所谓文化问题不仅是大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而是超越或者兼容不同意识形态、文明、民族、宗教的对话格局能够形成。

在全球化的这种格局下，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恰切的口号：它反映了后发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也肯定了发达国家的某种范导作用。发展在全球市场层面就表现为经济增长，但发展又蕴含了某些多样化的价值内容，提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与交易应该有更多人道主义考虑。

今天，很少有国家可以完全无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而在整个世界当中，北美、欧洲和东亚是全球化卷入程度最高的三个区域。身处东亚的中国虽然现代化起飞来得较晚，却已经迅速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一方面，它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背景密切相关，例如眼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它所引发的美元汇率、国际油价、粮价的攀升，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以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同时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例如直接引起世界各大股市的暴涨暴跌。因此，对全球化局势的应对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随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 五、粗略的前景展望

对于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福山多少有些意犹未尽地讨论了“历史的终结”，而沃勒斯坦的团队更多地认为“世界体系将作某些调整”，甚至“会发生体系危机或分裂，将会呈现为一个体系混乱期”。<sup>①</sup>“后现代”，还是“现代晚期”？世纪交替时人类的前景似乎出现了某种不明朗状况。而按照我们的理解，全球化的症结主要在于市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市场有强烈的动机继续扩张，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分配结果不仅造成能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在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的破坏尤甚），而且引起社会的不满甚至动荡（包括国际间冲突）；二是由于以前的市场多少受制于民族国家和民主化运动的调控，而今天更加全球化的市场似乎已经冲破所

有堤岸的束缚，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对其加以管理的“世界政府”和统一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全球市场的扩张挑战着民族国家的权力。而民族国家主权被剥夺或变相剥夺以后，露出的可能是赤裸裸的极端民族主义情感甚至无国籍的恐怖主义。

市场对主权的挑战早已开始。哈贝马斯在讨论公共领域的诞生时指出：“当时出现的一个大规模横向经济依赖网络，是原则上无法再由纵向的依赖关系来协调的”。<sup>②</sup>所谓纵向依赖关系其实就是指当时各传统国家及血缘家族的等级制体系（hierarchy）；而横向依赖关系则主要是指全球市场的流通与信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全球市场体系更是羽翼丰满，有着呼风唤雨的魔力。由于美国社会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其政府鼎力推动全球化进程，美国企业在全世界进程中获利最多，因而许多反全球化的声浪听上去很像是反美的呼声。的确，与纵向体制相比，横向体制体现了更多的公平，市场是一项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但放任的市场发展仍会带来新的等级制与不平等。甚至我们说，与市场相比，政府（尤其是传统国家的政府）也许是更大的恶，而一旦没有了这个更大的恶，市场很可能变得比政府更恶。因此人们希望宁可保留一个哪怕是有缺点的政府，让政府与市场相互制衡。这就是政府重新返回来进行某种方式的市场干预的依据。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浪漫设想，重新回来的政府自身必须脱胎换骨，经历政府职能转换，接受社会的充分监督。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世界史来看，各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拥有种种经济职能，而现在问题的复杂性是，世界政府缺失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20 世纪后半期，向着全球政府前行的努力大致也有一些探索，或许包括了联合国方式、美国方式、欧盟方式和东亚方式等。这里我们不去刻画这些具体的方式，只是希望

<sup>①</sup> 《转型时代》，第 246 页及整个第九章。

<sup>②</sup> [德] 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变化》，童世骏译，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6 页。

指出,现实主义的出路会在这些方式之间呈现。

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兼职  
研究员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  
究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

责任编辑:周勤勤

## An Understanding on Globalization

Zhang Jiangan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the basic contex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ies in China, even 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r attitudes towards this progression. Different countries carried out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face of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t three levels: modern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which propelled the global localization movements as well.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progression through triplex framework. From this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we can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of culture,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re roundly and profoundly, so as to deal with any complex international issue more easil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market; U.S.

### 观点选萃

## 数字主义与资本主义

黄小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黄小惠在《论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理论》一文中指出:数字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我们分析控制社会理论时必须提到的,因为这两个“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是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勒兹控制社会理论的现实背景。信息化技术的无限扩展为数字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软性”控制时代的到来扫清障碍。数字主义已在技术与经济的双重作用之下,演变成为控制社会的绝佳政治工具,数字化系统已经稳稳占据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地位。数字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俨然是一种天然的同盟,二者的联合带来的是资本形式的进一步变化。

资本在全球化时代的扩张可谓畅通无阻,以知识、数字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也被资本化,知识经济甚至成为全球化、控制社会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从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的生产、资本的输出和强行的武力征服为手段,“硬”性地建立起自己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控制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全世界都成为它的销售市场,通过对知识、政治、文化、传媒、信息的“软”性控制,建立起新的帝国主义结构。数字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姻,使资本的形式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数字化资本。尽管资本以新的形态在活动,可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倒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延续了下来。

(周勤勤 摘编)